

| 张 | 五 | 常 | 樊 | 纲 | 序 |

高小勇 / 主编

第四卷

Economic Imperialism

经济学帝国主义 IV

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当然指的是经济学在“侵略”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传统领地，比如下至婚姻、犯罪等个人社会行为的社会学领域，上至政府制度、宪法改革等政治学的领域，而且这种侵略并不是一些人异想天开的瞎胡闹，而是一旦发生了经济学的侵入，还真的能分析出一些原来人们没有分析出来的东西，给人们以新的启示，使学科有新的发展。

——《经济学消息报》精选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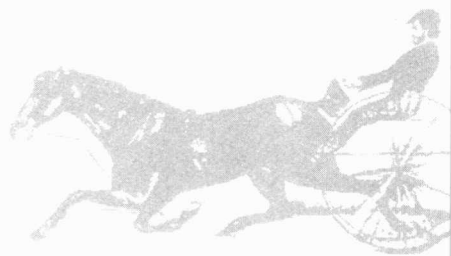
高小勇 / 主编

第四卷

Economic Imperialism

经济学帝国主义 IV

——《经济学消息报》精选文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学帝国主义.第4卷/高小勇主编. —北京:朝华出版社, 2005. 5

ISBN 7-5054-1221-3

I. 经... II. 高... III. 经济学—文集 IV. 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42073号

经济学帝国主义(第四卷)

主 编 高小勇

策划编辑 田 辉 王景伟 张宏宇
联智传播/慕云五

特约编辑 张伦忠 魏 睿

责任编辑 张宏宇 马海宽

责任印制 赵 岭

封面设计 刘 科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35号 邮政编码 100044

电 话 (010)68433188(总编室)
(010)68413840 68433213(发行部)

传 真 (010)88415258(发行部)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635×965毫米 1/16 字 数 261千字

印 张 18.75

版 次 2005年7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版 别 平

书 号 ISBN 7-5054-1221-3/G·0607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经济学帝国主义 (序一)

| 张五常 |

高小勇正在为他的《经济学消息报》结集出版一套六册的经济散文选，取名《经济学帝国主义》，要求我写个序言。我问：什么是“经济帝国主义”呀？他说：是“经济学帝国主义”，有一个“学”字。我问：什么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呀？他说：你是这门学问的鼻祖，写的经济散文就是，西方要推贝克尔 (G. Becker) 了。

孤陋寡闻，没有听过“经济学帝国主义”。两天前在一本英文书中看到 economic imperialism 这一词，说来自贝克尔 1976 年的论著。恍然大悟，知道指的是什么。贝克尔是老朋友，早就认识他，但从来没有听过他说什么帝国的。我是个老人家，对经济学的来龙去脉耳闻目染，比后生小子知得多一点。让我在这里略说一下吧。

做本科生时听到萨缪尔森 (P. A. Samuelson) 说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皇后 (queen of social sciences)。当时的理解，是在所有社会科学中，只有经济学是公理性 (axiomatic) 的。“公理”是指无须证明或不可辩论的出发点，也即是做分析的基础假设 (postulates)，是对是错皆要首先接受的。行外人不容易明白。这里要说的，是所有自然科学 (natural sciences) 都是公理性科学 (axiomatic science)，但在社会科学中 (包括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只有经济学是公理性的。因此，在科学方法上，经济学与自然科学 (生物、物理、化学等) 是完全一样的。

经济学的公理 (三至五个，组合不同) 是行内一般接受的。其中最重要是每个人在局限下争取利益极大化 (individual constrained maximization)，我俗称之为“自私的假设”。因为是公理，本身无须证明，而更重要是大家同意不容许有例外。我们不能说一个人有时争取极大化，有时不争取，或有些人争取，有些不争取。如果容许例外，逻辑无从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 (或可以被事实推翻) 的

假说。这样，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就不可能有解释能力了。

接受了公理，加上理论逻辑，推出可以被事实或行为或现象推翻的假说，然后验证其含意，是经济学解释人类行为的法门。这与自然科学没有两样，只是经济学解释人的行为，而自然科学则解释物体的行为。现象不同，方法一样。

问题是，人的行为有多种，可以分门别类，经济学可以解释的究竟是哪种哪类呢？新古典经济学的大师们一般认为，经济学解释的是起于资源缺乏而导致的资源使用与财富分配等行为或现象。这样处理，经济学集中于市场分析。近百年来，视觉较广的知道，很多起于资源缺乏的现象没有通过市场——无价不咸市。新古典经济学的严重失误，是不言而喻地假设交易费用不存在，避去了非市场的分析。科斯(R. H. Coase)于1937年指出，交易费用导致某些物品没有市价，因而促成了公司组织的形成。该文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1982年，我指出没有交易费用不需要有市场，而市场的存在是为了减少交易费用而起，把问题增加了深度。

经济学帝国主义起于市场之外的另一面：好些表面看来与资源使用和财富分配扯不上关系的行为，可以同样地用经济理论做解释。这观点起自经济学鼻祖斯密(A. Smith, 1776)，而现代的首要推广人是贝克尔。后者50年代的博士论文题为《种族歧视的经济分析》(*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顾名思义，分析的是传统市场的题外活。其后贝克尔进军家庭、生育、犯罪、离婚等现象，皆遵守着经济学的公理与逻辑。这些行为在贝克尔之前主要是由社会学处理的。不要忘记，早在60年代，布坎南(J. Buchanan)与杜洛克(G. Tullock)等人就以经济分析政治行为，与古典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是不同的。

遵守着经济学的公理与理论，把解释的范围推广至人类的所有行为去，是把萨缪尔森的社会科学皇后提升为社会科学皇帝。这就是高小勇说的经济学帝国主义了。

成功吗？有的，但说不上有大成，因为分析着实不易，而不少参与者走错了路向。大略而言，不成市的行为起于两种原因。其一是因为交易费用过高而没有市价。原则上可以有价，但没有。政治上的权力，组织的需求，文革时搞关系等都是例子。可以有价但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而不成价所引起的行为，处理虽然不易，但知道可以有价，知道利益“极大化”要选的是什么，我们还可以用金钱或财富来排列选择，分析不会太困难。

其二就较为困难了。这是原则上没有市价的“物品”——交易费用如何也

是无价之“物”。例如个人的声誉（捐钱可以买一点，行骗可以骗一点，但一般买不到，骗不来），纯真的友情（李白要以桃花潭水深千尺来量度），父母对儿女的爱（有些轻于鸿毛，有些重于己命）等，有关的行为的经济分析很头痛。我们还可以加上自杀、恐怖活动等行为，头痛要再加心痛了。经济学公理说，损人不可以毫不利己，但我们有时不知损人的己利何在。

原则上不可能有市价的被称为非金钱物品（non-pecuniary goods），贝克尔与阿尔钦（A. A. Alchian）皆认为要以功用（utility，国内译作效用）来量度。这方面，贝克尔的所有分析都用上功用函数（utility function），是个中高手了。有不易处理的困难。功用是经济学者的思想概念，真实世界没有功用这回事。说争取功用极大化，是说一个公理，功用本身看不到，从何以事实验证呢？一个人跳楼自杀，说是争取功用极大化，不可能错，但那只是公理划下来的套套逻辑，说了等于没说，半点解释力也没有。

功用是抽象之物，真实世界不存在；理论往往要从抽象起笔。然而，可以验证的假说的含义，一定要以两个或更多的可以观察到的现象变量从事。功用是抽象之物，我们要怎样把抽象推到非抽象的假说含意去解释行为呢？这是功用函数理论的主要困难，因为一不小心就走上套套逻辑的路。二十多年来，博弈理论的盛行更令我失望。不是说人不会博弈，也不是说这些理论言不大理，而是得个“讲”字，无从验证。

阿尔钦明白功用分析的困难。他说要验证抽象的功用分析，我们要首先知道什么“物品”有功用，又要知道争取这些物品的代价。我的观点，是如果知道了这些，采用抽象的功用理念是多此一举。这是因为非金钱物品虽然不可在市场成交，但原则上可与金钱物品（pecuniary goods）替换——正如我与儿女之间的爱不可以买卖，但放弃自己的某些金钱物品（例如工作时间）我可以多点与儿女相聚。这替换在边际上可以鉴定，可以观察，于是原则上可以用金钱量度来推出以事实验证的含意，放弃功用分析。

1972年我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传统婚姻的文章，以上述的替换方法，用金钱量度极大化来解释盲婚、缠足、童养媳、妾妓、孝道、伦理、风俗等现象。该文没有受到重视，可惜可惜。那是我知道的惟一以金钱量度来广泛地解释社会现象的经济学文章，前不见古人，今不见来者，是区区在下的帝国主义了。

经济学的谦虚 (序二)

| 樊 纲 |

十二年前，高小勇先生创办了《经济学消息报》，力邀我们这些经济学者为其写稿，并特别鼓励我们写那些用经济学的原理对实际生活中各种现象进行深入浅出分析的杂文、随笔。十几年来，这类文章应该说在经济学的普及上、在帮助人们深入理解社会现象上、在推动我们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上，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使得高小勇得以将《经济学消息报》发表的这类文章，洋洋洒洒编成六卷本的集子，呈现给读者，并起了一个很有点刺激性的书名，《经济学帝国主义》。

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当然指的是经济学在“侵略”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传统领地，比如下至婚姻、犯罪等个人社会行为的社会学领域，上至政府制度、宪法改革等政治学的领域，而且这种侵略并不是一些人异想天开的瞎胡闹，而是一旦发生了经济学的侵入，还真的能分析出一些原来人们没有分析出来的东西，给人们以新的启示，使学科有新的发展。

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当然是与它的特殊的分析方法相联系的。首先，经济学在本质上其实不像有人从表面上所看到的那样是所谓“数钱的学问”，它所研究的是人的行为，是人们如何在资源（包括时间）稀缺的条件下，通过行为的改变和选择的改变，取得最大的效果。所以在一定意义上，经济学是一种“行为效果学”，只要在有人和有人的行为的场合，无论是学技术还是学弹钢琴，是搞企业还是搞政府，是生产还是结婚，是写合同还是写宪法，这种行为效果学的基本逻辑和基本分析方法，可以是通用的。其次，经济学不仅研究个体的行为，而且研究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当然没有什么特别的，一切社会科学都是在研究人与人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社会关系。但是在现实中，生存的需要总是人们基本的需要，人的一切活动都有赖于资源的消费和收入的分配，经济利益总是构成人们一切利益的基础，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甚至

认为经济关系构成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而其他社会关系，如政治制度、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包括伦理学所研究的伦理道德等等，只是这一基础的“上层建筑”。因此，理解了经济关系，的确也能对其他社会科学所研究的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经济学就显得很“强势”，很“嚣张”，很“显学”。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概念当然最初是由经济学家自己给出的，以形容经济学的扩张趋势，而现在当人们说开去后，这个词可以让人们对经济学产生一些误解，以为它可以无所不能，或者是它在自吹无所不能，以为它很狂妄。

其实，真正的作为科学的经济学是很“谦虚”的，甚至说是很“谦卑”的。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如果一个人真的搞懂了经济学，他会是很谦虚的，因为他会知道经济学所能够说明的、能够解决的问题，其实是很有局限的。

首先，经济学家知道，不论他能如何说明人的基本行为方式，并建议一个人可以如何思考、算计，以改善自己的境况，但是一个人如何做出他们的选择和经济决定，却只是那个个人自己才能做的事情，经济学家不能替他做决定。这是因为，经济学分析所依赖的那些基本的概念，即“幸福”或“痛苦”、“效用”或“代价”这些基本的概念，完全是“个人主义”的——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套独特的评价标准、价值体系（经济学的术语是“偏好”），包含小到吃饭的口味、穿衣的喜好，大到伦理道德、意识形态，都可能是不同的。而且，每个人当前所面临的方方面面的具体条件——他的能力兴趣，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等等，也是不同的，他对自己和社会环境未来变化的预期等等，也都是不同的。所以，即使经济学家知道一个人总会按照我们大家所接受的那个“公理性假设”即人都是要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逻辑来行事，我们也不知道每个人所要最大化的那个具体的“利益”体系究竟是什么。也许我们可以以我们对人们行为方式、对市场或社会整体变化趋势、对宏观经济运行趋势的分析，为人们提供更多的信息与知识，使他们信息更加完全，从而做出的决定更加正确，但也仅此而已，我们还是不能代替每个个体（个人与企业）做选择、做决定！我们甚至没有资格评判任何别的人的决策正确与否，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究竟是根据什么偏好体系做出的那个决定！比如说，如果我们假定一个人“化妆”还是能为自己增加一些幸福，又假定他花在住房上的支出“效用递减”，我们就会建议他不妨少花一点钱在房子上，而多花一点钱“修修边幅”，这样可以增加他的总幸福。但是，在现实中，我们的那些假定可能对于一个人来说完全不适用，他的偏好体

系的特点就是“化妆”不能为他提供任何效用，那经济学就只好“闭嘴”，因为那只能是他个人的决定。

这种“偏好的个人特殊性”，导致了经济学在定量分析和“科学证伪”上的很大局限。我们可以用“偏好”、“效用”一类抽象的概念，就人的许多行为的基本规律做出一些“理论假说”，包括经济学帝国主义意义上的结婚、离婚、犯罪、改革制度、追求平等许许多多人的行为的假说，但由于这些行为所涉及的“物品”（goods or bads）不能有一个市场价格（定价的交易成本太高），我们的定量分析就只好到此为止——由于偏好或效用的个人性和人与人之间效用的不可比性（不可通约），我们只能以“假说”的方式告诉人们人的社会行为的一些大致的逻辑，但无法进行精确的定量分析，很难对这些假说进行严格的证伪。

第二，经济学不仅不能替代个人做决定，而且不打算改变人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经济学总是以不同的人的不同价值观念为自己分析经济社会现象的前提，而不以改变人们的观念为己任。你爱吃酸的还是爱吃甜的，你是好旅游还是好吸毒，你是否只关心自己和自己的孩子，还是你也关心你的朋友和你的国家，对于经济学来说只是你的个人偏好，你的价值判断，也许你在伦理学家或政治家或神父或文学家或记者的说教、感召、影响下可以改变你的价值观，改变你的行为选择，但那不是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的使命，经济学只是把你的特殊偏好当做分析的前提，你改变了，再把你新的偏好作为前提，但经济学家原则上不打算去改变你的想法。有些人总是想赋予经济学更多的使命，想把改变人们的道德观念也列入经济学的范畴，那就不是经济学帝国主义了，而是成了“经济学强盗”，因为那是在攫取不属于你的东西。你作为一个人，可以既是经济学家又是伦理学家，但是当你进行伦理说教的时候你可不是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在活动，因为经济学谦虚，没那么野心勃勃要改变人的偏好。有人曾问我，市场经济由于存在“多次博弈”，不讲信用的人最终会受到惩罚，如果人们认识到这一点，就会比较讲信用，所以在市场经济下人们的信用道德会有所改善，这不是说明经济学与道德伦理有关系、经济的运行可以改变人们的道德伦理吗？可是你仔细想一下，所谓的商业信用，可不是因为人们改变了他们的信用道德，而是因为人们发现不讲信用在市场经济下最终是“不合算”的（会被惩罚），也就是说还是出于“算计”，才改变了他们的行为，而不是因为“变善”了而改变了行为。使人们“变善”这件事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值得我们每个人作为个人去努力的事情，但经济学不把他当做自己研究范围内的本

职工作。经济学的本职工作，是通过制度和政策的改变，去改变人的行为（比如让不讲信用的人受到惩罚）。换言之，经济学不去批判小民的道德，而是批判当权者定下的制度！

第三，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局限性，经济学在公共政策问题上的作用其实也是很有限的。经济学的确能够为公共政策问题和体制改革问题（这是一个基本的公共政策议题）做出自己的贡献，因为经济学的任务之一就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一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如何构成其他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约束条件，而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努力又必须把其他所有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当成自己的约束条件（这些都基于资源稀缺性公理性假设）；因此，经济学能够以“均衡”一类的基本概念告诉大家，我们的所谓利益最大化，其实都是“条件极值”，是“不可能再大”，而且为了达到这一均衡点，我们大家也要相互有所妥协，你占的好处太多，别的人、别的利益集团就会“反弹”，到头来你的损失会更大。比如社会平等这件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般的逻辑是只要机会均等、合法竞争、不坑蒙拐骗、不搞特权与腐败，贫富差别的出现，就只能归结为人的先天差异、后天努力、机会运气等，有其不可避免的性质。但是，给定任何一个社会在任何一定时期的意识形态（这对经济学来说是“外生的”约束条件），富人集团如果完全不考虑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会使社会关系越来越紧张的后果，拒不进行必要的或合理的收入转移和扶弱济贫（什么是必要的或合理的？这对经济学来说当然也是一个不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在此经济学家必须非常谦虚！），社会最终可能陷入动乱以至内战的状态，富人致富的条件和享受财富的环境就会发生改变，对富人来说，也是“不合算”；而富人多缴一点税用于社会福利，在一定范围内对他们的长远利益可能是“合算”的。（请注意，这里经济学所依赖的也不是富人的“善心”，而是他们的“算计”。那些寄希望于富人“良心发现”的人应该想一想，人们的良心要是总不发现你有什么办法？！）而与此同时，经济学也会对“穷人集团”（以及那些想拉穷人选票——在一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这个穷人集团可能拥有选票的大多数——的政客们）说，你们如果对社会福利的要求过高，搞太多的收入转移，最终可能会使你这个经济的生产成本过高、投资收益太低，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下降，最终会没有人再投资，就业无法增长，多数穷人的状况就无法实现根本的、长远的改善，整个国家会陷入长期停滞的陷阱。因此，在这里，经济学所提供給社会的“政策建议”，不是“拉一派打一

派”，而是告诉大家，收入极端不平等是对大家没好处的，但是那种“民粹主义”的公共政策和社会保障，想过早地搞那些发达国家搞的社会福利制度，也是对大家都没好处的，我们应该不走任何极端，而是追求某种“可持续的均衡”。

但是让经济学再做更多的事情，它的局限性就显示出来了。由于经济学所依赖的基本概念如“效用”、“偏好”等等，都是“个人主义”的，无法进行人际之间的比较与计量，经济学其实很难对公共政策的社会效果，做出准确的和科学的判断。在这些问题上，经济学惟一可以使用的理论工具，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最优”或“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最优指的是：当社会达到下述状态的时候，已经无法在不使（至少）一个人的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使另一个人的境况变好，我们就称这种状态为“帕累托最优”（因为最初这个概念是由一位名叫帕累托的意大利经济学家定义的）。可见，这么一个经常被一些人似是而非地当成是“最佳状态”的帕累托最优，其实只是说“我们无法再使情况变得更优”，或者更精确地说，它指的是：再做任何改变，我们经济学家不知道情况是不是会变得更优，所以我们只好把这个最容易判断的情况认定为“最优”！也许一项社会变革比如反垄断这么一个体制改革，可以使社会上99%的人的福利得到改善，但是对于经济学的“帕累托标准”而言，只要有一个人，即那一个垄断者本人受到了一点损失，经济学也无法“理直气壮”地说（尽管现实中有许多经济学家都在那里稀里糊涂地人云亦云），这一改革使整个社会的状况有所改善，因为我们不知道那99%的人的福利增加总和，是不是能够弥补那一个人的福利的减少。这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经济学不认为我们可以将那99%的人的效用与这一个人的效用进行通约与比较！只有假定在反垄断的过程中将取消垄断之后资源效率改进所产生的新增收益的一部分，对那个垄断者进行了他自己所认可的（经济学家认可不算数）“充分补偿”之后，经济学才能“认可”实现了改进，因为经济学所能论证的改进，只是这种帕累托改进。因此，所谓帕累托最优，只是经济学所能够确认的不能再优，而帕累托改进，只是经济学惟一所能确认的改进。它们都是表明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实对于一切不是“一致同意”、做不到没有任何人反对（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个人的利益受损）的其他许多可能的社会状况和可能的社会改进，没有发言权！

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懂得为什么在反垄断这样的公共政策问题上，以及其他种种公共物品的提供问题上（请注意制度也许是一项最重要的公共物品），会有那么多的利益阻碍，会是那样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没有

一个绝对的真理和权威（首选是因为经济学无法提供这样的真理和权威）。也正是因为如此，经济学在公共品的问题上，走上了政治经济学的道路，要对政治这一公共品配置机制进行分析，去研究公共政策的决策机制，甚至是在宪法层面上的决策规则，比如是“一致同意”还是“多数票原则”、公民投票还是“代议制”决定，等等。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明白，好的经济学者一定会是谦虚的，因为任何一项经济决策都不是经济学家自己所能做出的！私人的决策或一个企业的决策，是要由当事人个人决定的；而公共决策则是要通过一个社会程序政治由许多人（包括政治家）和许多学科（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等）的研究成果共同起作用的结果，经济学家的贡献无疑是但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很多情况下可能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只有那种一知半解的“经济学半瓶子醋”，才会声称某个政策都是由于他的贡献。好的经济政策建议，当然要遵循经济学的逻辑，因为这是你的专业，是你解释世界的特殊角度，你要是想从其他学科的角度来谈问题（比如以道德先生或神父的立场说话，或者没人任命就把自己当政府），你反倒没有发挥你的特长，没有做好你的本职工作，贡献反倒小。但是经济学家在做政策建议的时候，也要尽可能地意识到其他角度的存在，其他学科的存在，其他逻辑的存在，无论你是否认为那种逻辑不成逻辑。

不过把以上的问题都搞清楚之后，反过来我们也要说，经济学不能“包打天下”，其他社会科学也许就更不能包打天下。经济学说到底由于它分析方法的特点，还是能比其他社会科学更加科学一点，解释力更强一点，可解释的问题更广一点，也就是说，更“帝国主义”一点。

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同意为这本《经济学帝国主义》作序，也希望更多的读者通过此书更加喜爱经济学这门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

2005年3月9日 改毕于赫尔辛基

我们都是经济学帝国主义者 (自序)

| 高小勇 |

这本散文集的名称，是浙江大学的魏睿建议的。

我觉得魏睿突然想到的这个书名，很贴切地反映了这套总共六卷的集子的内容，也很准确地表达了《经济学消息报》和她的作者们多年来的追求。

我请张五常教授为本书写了序，因为他无疑是华人世界里用散文来表达自己经济思考的开山鼻祖。我还邀请了樊纲教授作序，是由于十多年前我向他约写经济学散文，他鼓励这种追求，并且第一个为报纸写了散文。

《经济学消息报》有许多缺点。但是，她在中国的媒体首先提倡和实践了经济学散文写作，她有她当之无愧的骄傲。

(一)

对国内兴起的经济学散文写作，有褒有贬，褒扬的人说它普及了经济学知识，批评的人很不屑，说它不是正经的研究。

关于经济学散文的普及说，它有一定的道理。《经济学消息报》发表的文章里，不少是用故事来说明一个经济学原理的，比如茅于軾老师、王玉霞教授等人的文章。但很多文章并不是在普及原理，而是只将原理当做隐含的前提，应用原理，根据自己发现和断定的约束条件，解释和推论某种社会现象。认为文章写得可以让许多人看得懂就是普及，那是一种误解。应用是通过经济分析让人理解某个真实的现象，而普及是用真的或创作的故事来说明某个原理。某种运用，可能跟普及原理的经济学连环画一样，都让人能看懂，但那已是研究。

说一些经济学散文是研究，肯定让满脑子都是正规应试格式，一心要去国际上表演的人发出嘘声。我自以为我理解这种对经济学散文的不屑。我认为，

这种不屑是中国经济学在改革开放后的一种巨大进步。相当多的老师和学生已经明白了真的知识的生产应该有个生产程序,否则学问就会和我们现在也不难看到的情形差不多,不少经济学家依然跟以前一样,凭感情好恶,凭自己的道德价值观说事;好一点的,至多就是用事实解释事实。这样做研究,或许能让人享受到一腔正气,大义凛然,但能交流的只是感情,不是知识。(前不久,有人对许多经济学家进行了不客气的评论,那位姓果的经济学家的评论标准很奇怪,好坏的标准不是根据他们研究问题的方法,是否符合知识生产的程序,是否科学,也不是生产的知识真假与否,而是根据什么独立性、独立人格。他讲的独立人格是什么呢?就是对政府是否持批评态度,是否为人民大众讲话。我以为这对知识要求过高。知识只对事实与事实之间是否有某种关系发言,而不对某个阶层的利益发言。科学的独立性,科学发现和验证的事实之间的某种关系,可能对政府有利,可能忤逆大众感情,或者情形恰好相反,对社会各阶层可能有着不同的利弊影响。但是,真正的知识,是既不在乎政府也不在乎大众的,它只在乎事实之间的真假关系。要说独立性,这才是知识的独立性。)

一般讲来,按照大家承认的程序生产的知识,才可能真,可能科学。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大学才开始训练和传授关于知识如何生产的程序。用数学能逻辑清晰地表达你生产的知识,也方便交流和积累;严格的引证和详细注释也有助于他人了解你的研究范围以及你可能的新的贡献。学习这些手段是我们与国际接轨之必须,但却不是知识生产程序最重要的东西。我以为,最重要的东西是波普尔讲的“猜想与反驳”这样一种程序。猜测和假设某种可被反驳的事实之间的抽象关系,然后演绎推论解释可观察的事实。你的猜想假说是不是原则上可诉诸于可观察事实,可诉诸于多少?你的可观察事实是不是为猜想假设所蕴含?这才是生产知识必须遵守的最重要的程序,是科学知识这块硬币的两面。生产照这样的程序进行,再利用数学工具,生产的知识可能更清晰更经济。而且,大家都知道用数学形式化了的知识,国际刊物才买单。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用了数学的研究,并不一定比没有用数学的研究更有科学性。张五常写了许多经济散文,没有数学;但与许多刊物上的数学公式充斥的论文比,究竟谁真谁假呢?谁更具启发性,更让人受益呢?我以为,判断一篇文章是不是认真的研究,断定的事实关系的真假如何、有多少科学性,主要是看它是否遵循了猜想与反驳的生产程序,而不是数学。

由于一些局限,我更看重照猜想与反驳的程序生产的、没有数学公式的文

章。一是我们是报纸，篇幅有限，不可能展开详细的证明，能做的，就是反复告诉作者写那种含有新的因果关系猜测假设的，又有简单的演绎推论可观察事实的文章。强调文章的启发性和大致的对，而不是详细确凿。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需要更多的理性和科学精神，而我向来认为经济学并不仅仅是有关经济增长的知识，而是理解人的行为世界最好的科学，最能增加人的理性和科学精神。如果中国有更多的人用经济学的角度看社会、看世界，中国会有更快的发展和进步。这门能增加中国理性科学精神的学问，如果由于数学的屏蔽而不为更多人所知，那将是巨大的社会成本。

是的，《经济学消息报》和她的许多作者，是把经济学作为理解人的世界的一把钥匙。毋庸讳言，我们是经济学帝国主义者。我们不仅运用经济学研究人的经济选择，也鼓励研究政治、军事、外交等等选择。我们认为，只要是人的选择，就会在局限下趋利避害并权衡成本收益，就会有在“价格”支配下的选择行为。只要理论彻底，约束条件洞察准确，演绎推论的行为选择就会大致的对。报纸坚持把经济学当做把握人的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我知道，我这种看法在经济学内部和外部都有数不清的人反对。的确，在经常与人交流时，这些反对也让人焦灼。

(二)

一门被叫做“经济学”的学问，向来被人当做是研究经济的一门科学。在我看来这是误解。我更愿意把“经济”看成是谓语、动词、形容词。而不是主语、名词。研究、议论经济可以有很多角度，也可以是经济学的，也可以不是，可以是政治的、道德的，甚至宗教的（比如宗教对可不可以借钱、放贷就有看法）。事实上，有不少经济学家也不是从经济的角度研究经济，他们是在研究经济、议论经济，他们被人当成经济学家、出了大名，一是他们因为说话使用了经济学的术语名词，二是他们的某些言论迎合了大众和政府的心情。但却跟经济研究没什么关系。

我以为，所谓经济研究，就是从“经济”这一角度看世界，既看人的投资消费选择，也看政治、道德、外交、婚姻等等选择。经济研究要回答解释的是，人由于什么“经济”而选择了如此行为；当然，作为一门科学也要提供预言知识以节约人们行为的成本，要推论在某种“经济”的条件下，人们会做怎样的

选择，以及这种选择的后果。经济学是研究人的行为选择的科学，既研究人的消费投资就业选择，又研究人的制度选择、外交选择、战争选择、官吏的选择等等。

经济学的“经济”当利害讲，利就是经济的，害就是不经济的。用趋利避害来解释和推论个人和集体的选择行为，从趋利避害角度来看人的选择的前因后果。不少人反对这个世界观，他们用了很多例子来证明不少的人在许多时候是自讨苦吃的。其实，这只是表明，持这种看法的人一是不尊重他人，常常把自己的价值现强加于人，把自己的利害当成别人的利害；二是不了解利与害在某种条件是变化的，不了解一门科学作为一套首尾一贯的逻辑系统，一般到个别，抽象到具体之间，是通过“边界条件”或“约束条件”联系起来的，有着或长或短的因果道路要走。往往，一般与个别的矛盾不一致，就像开初牛顿力学与行星运行的实际情形不一致一样，只是由于我们还不知道一般理论与具体事实现象之间的某一环，也就是经济学讲的约束条件罢了。对经济学从趋利避害和“经济”角度概括人的选择行为，有许多反对意见，我以为大多是既轻易又浮躁。我的解释是，对既无耐心又无能力去发现一般理论和具体事实之间复杂联系的人来讲，这倒是局限下的最大化，是代价和成本都很低的好选择。因为我们社会有这种需求，尤其当这种需求像大排档消费那样，来得并不苛刻的时候。

就研究人的行为而言，经济学或许不是最好的学问。但我不知道最好的学问是什么，即它能满足科学知识所要求的从一个简单的角度看世界，能首尾一贯的演绎出可观察可证伪的事实；既能解释人的行为又能大致准确地推论人的行为。（有些人希望经济学能像物理学那样“精确”地预言人的行为及后果，并认为有这样的预言效果才叫科学。其实这些人并不了解人的行为与被动物质运动的区别，也不了解支配行为和运动的条件大不一样。希望经济学的推论像物理学那样精准，而不是大致的对，恰恰是不科学的。）

事实上，西方世界从“经济”角度看世界，从趋利避害角度看人的行为选择，才有了了一系列理性的制度安排，才有了我们今天叫做“发达”的后果，才贡献了我们承认需要学习的先进文化和文明，才有了先进生产力这些东西。也正由于正视了人的局限不同而利害价值现不同、需求和选择不同，才有了对市场经济和人的自由的尊重。更重要的事实是，不承认趋利避害决定着人的行为选择，把人神圣化的，把利害一律化的世界观，从来导致的就是统制经济和政

治专制。古代斯巴达把社会兵营化和我们记忆犹新的计划经济难道不是一个东西吗？

无论是从知识的角度，还是从价值的角度，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经济帝国主义。这是我对人的世界的世界观，即从“经济”的角度，从趋利避害的角度，去看人的所有行为选择。我也认为，如果有更多的人这样看世界，社会就会更理性，也更有科学精神；自己的国家也会更发达更文明。

经济学帝国主义，从方法论方面讲，是把形形色色的利害概括为“价格”，这或许是一种不幸。它导致许多界内和界外的人至今不了解什么是“价格”。许多人以为就是商场里的明码标价，或如汪丁丁与我讨论时所指出的那样在误解“价格”，以为价格是度量单位。而这样的“价格”是解释和推论不了多少人的选择行为的。而经济学的所谓帝国主义，正是通过用价格来最一般化地概括人世间的各种利害，通过“需求”来概括人的林林总总行为选择来实现的。

价格理论用成本概括害，用收益概括利。利大于害视为价格低，反之视为价格高；价高选择的人就少，反之选择的人就多，人也就是如此趋利避害的。科斯是用成本的角度看世界，但张五常跟我讲，用价格来概括利害，理论上更首尾一贯和逻辑一致。我想，理由大概一是从价格角度看，必然蕴含着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因为有比较才知道价高价低；二呢，既然把各种利害处理成价格，把各种选择处理成需求，顺理成章就好在需求定律框架里解释和推论。不了解价格可以这样概括利害，需求可以这样概括人的行为选择的人，才对经济学帝国主义有一堆昏话。

事实上，价格如此概括利害，需求如此概括人的选择，经济学才在人的世界获得了比其他社会科学辽阔许多的疆界，才因此成了“皇冠上的明珠”；而不如此“帝国主义”看价格看需求的人，也难得知道何谓价高价低，也无法解释和推论需求及人的选择的。价高价低是真实世界的事，不少人不知道离开约束条件是不可以议论价高价低的。约束条件是真实世界的事，而要发现真实世界里什么事情导致了利害变化和价高价低，会有什么样的选择发生，是很快乐很享受的事。

2002年底，我将恐怖主义处理为是使美国“价格”变高变贵的约束条件（也就是把安全处理为“价格”变量），推论了中国因安全而“价格”变得相对便宜，国外消费和投资需求将选择中国而来，离美国而去。2003年初，美国公布的外商投资额第一次降到中国之下的事实便验证了这个假设。